

贷者，最终不仅没有因为拥有土地而改善生活，而且背负沉重的债务。而对伊朗农业至关重要的坎儿井（干旱区特有的暗渠水利系统）由于没有了由地主组织的维护而毁坏，丧失水源后，数千个有生产力的村庄也将随之衰退。流亡海外的霍梅尼，在演讲磁带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国王巴列维是“犹太人的代理人、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”。

霍梅尼的演讲磁带被偷运到伊朗，私下里广为传播，大行其道。在原教旨主义信徒看来，既然是异教徒迫害教徒，出现了经济问题，于是以清理国王这个异教徒为目标的圣战，成为解决问题唯一的选择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约有 10% 的国民参与了伊斯兰革命。与此比较，开启欧洲大陆资本立宪改革的法国大革命，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 2%。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之处还在于，绝对贫困人口在革命后的头六年内增加 45%，且外有西方制裁、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的情况下，政教合一的伊朗现政权能够稳固下来。而原教旨主义最恐怖的地方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漠视。霍梅尼的名言就是：流血是必要的，伊朗流血越多，革命的胜利就越大！

在已经出现原教旨主义文化破坏维吾尔传统文化，并威胁新疆稳定的苗头的情况下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，不能再回避。以经济发展迂回“柔性”对付原教旨主义，全世界尚未有成功先例，反而有伊朗的教训。**伊朗的事例说明经济发展（通过白色革命，伊朗的人均 GDP 从 1961 年的 160 美元跃增为 1978 年的 2200 美元以上，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）反而可能刺激原教旨主义蔓延。**笔者认为，一个保护维吾尔文化，打击原教旨主义的战略必然会得到维吾尔的开明人士、知识分子的支持。原教旨主义革命在伊朗胜利后，伊朗知识分子，开明人士的不是被迫害入狱、就是流亡他国。

同样，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也会得到维吾尔的上层精英的支持，因为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吾尔传统文化之始，就是维吾尔族回归到“反现代化”的“中世纪”的开始。这样一个战略，还会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，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支持。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新疆站住了脚，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向中亚扩散，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。这样一个战略也能够争取到美国的支持，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。试想，一旦原教旨主义文化在中国新疆盛行，就会在伊朗、阿富汗、中国新疆形成一个孕育恐怖主义的“新月形”战略走廊。这样一个结果，不仅是美国制衡伊朗的战略受挫，更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失败。

打击原教旨主义、保护与发展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战略，要避免简单套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法。如果用胡萝卜加大棒能够解决的问题，那就肯定不是文化问题。

（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，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，本文刊于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2013 年 1107 日）

【网络文章】

十年后，回顾新疆“内高班”

热依莱

第一届新疆“内高班”（内地高中生班）的学生，毕业马上就要十年了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制，“内高班”的设立，对于新疆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，我想现在评判还为时尚早。十年之后，作为其中的一员，回顾那四年，对个人而言，虽然影响深刻，但却也并不十分怀念。

模糊的“内高班”

2000 年，即我上初中的最后一年，在父亲的要求下，我参加了“内高班”的考试。当时，



我们对“内高班”这一政策没有任何了解，仅仅知道自己如果有幸考上，就会交很少的学费，会去内地教育质量很好的城市读四年高中。至于会去哪个城市，根本不知道。第一年的“内高班”政策——选拔一千名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去内地上学。比例在很大程度上，会向来自农牧民家庭的“民考汉”及“民考民”学生倾斜。

记得那一年的暑假，过得异常挣扎，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会让父亲很没面子。等一切焦急过去后，我收到了宁波中学的入学通知书，注明我的学费是900元人民币一年，这是按照学生家长的收入决定的，还有一些同学交450元，另有一些人不用交任何费用。至于家庭收入应该怎么统计，也没有任何公开说明。入学通知书还规定，我们只能两年回一次家，当时因为很高兴，也没太在乎这些。我想，我们之所以激动，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、被国家培养的通道。

不过，妈妈并没有为此高兴，因为我将远远地离开家里人到很远的地方。只是因为她几乎不能左右父亲的决定，而只能由他。虽然我对自己离开家人也心生一丝难过，但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团场、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十几岁初中生来说，对未知的宁波也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期盼。

我们被通知到地区市中心集合，然后一起去乌鲁木齐。

我们是半夜到达乌鲁木齐，我依稀记得乌鲁木齐是一个危险的城市，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去。我们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，有好几次集中学习，介绍我们的带队老师。记得我们开完集体大会后，因为我还戴着头巾，穿着长裙，被宣传这一政策的记者抓到，要我表示感谢党的政策……。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才知道，如果当时教育厅严格调查我的户籍，估计我根本不能成为他们计划培养的一员，因为我来自兵团，而据说第一年没有给兵团名额。

现实的“内高班”

宁波中学第一届招了80名学生，是招收“民考汉”和“汉考汉”学生的四个城市中的一个。其余三个城市分别为深圳、天津、苏州。

宁波是一个很美的城市，但第一年，我们80个人被安排到一个离原宁波中学比较远、本来准备做聋哑学校的校区。刚开始的几个月，很多同学对这个安排非常不满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因为和别的城市比较后，觉得宁波中学对我们很不公平。

前面几个月，大家都非常想家，几乎每个人都天天打电话回家，然后天天都哭得很厉害。我也是其中一个，直到有一天被父亲狠狠地说了一遍，不要天天打电话……

另外，由于我们的餐厅没有穆斯林厨师，开始几个月，很多同学愤愤不平。但几个月的不平过去以后，一次评估考试把我们拉回了现实。因为“民考汉”学生的成绩和“汉考汉”学生相比差距实在很大。在这次评估考试后，老师的单独谈话让我们突然明白了，我们之所以来到“内高班”，是为了学习，而不是为了讲究生活条件。

而我们很快也都习惯了严格的作息制度。早跑、吃饭、早自习、午休、晚自习……外出还另有规定，必须至少两人一起外出，外出时间不能超过特定时间，如果违反将会记过处分，取消一次外出机会等等。

由于自己一下子从过去的好学生变成了差等生，情绪变化很大。

“内高班”的第一年是预科。这一年，听说很多其它城市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而得了精神分裂，被送回新疆，甚至有人想自杀等等。这些都是传言，当时没法证实。到了大学，非常凑巧，我的室友是个杭州新疆班的女孩子，她说她们学校的确有人有过自杀企图。而另一个学弟的哥哥，上海新疆班的学生，确实由于精神分裂而被送回去。而在宁波，预科结束后，由于成绩不合格，四名男生被退回。这些名额到了高一很快就被补上了。

预科考试结束后，大家要求学校送我们回家。因为学校没有收到新疆教育厅的通知，就让我们在学校无所事事地待了两周，然后才通知我们可以回家……



高一，又有新的预科生来到了我们学校。由于新来的学妹、学弟们非常顽皮，老师们一直对我们第一届学生的听话赞不绝口。但是，记忆中听到的最多的话，就是好好学习，提高自己的排名。

高二，我们终于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安排到了同一个校区，但是，新疆班有自己的一层楼，我们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除了在体育课和音乐课上有些交流外，其余时间都是新疆班学生自己玩自己的。

高三，学校为了我们不被打扰，而把我们安排到了最高的一层楼，和其它宁波中学的高三学生同一层。这一年，有几个宁波中学本部的老师也给我们上课，但是，那种无名的压力，有时候几乎让我无法呼吸。

这四年下来，我的视力由5.2变成了2.5。我唯一没有为学习而改变的，就是我的长发。虽然自高一开始，英语老师一直要我把头发剪短，方便学习，但我坚持不剪。现在想着，觉着自己当时不是固执，而是有些荒谬。

当然在这四年里，学校也组织我们去很多地方游玩。比如杭州西湖、绍兴等等，但是我们去上海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。

十年后的反思

高考前，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重地对我们说，等到十年之后，你们再想起来这段努力的岁月，你们会感激这一切。但是，现在，我想我不再同意她的看法了。十年以后，如果再让我选择，我可能不会再选择“内高班”这样的读书方式。

报大学志愿时，我们有另外的名额，所安排的大学和专业都很不错。而且考师范类院校不需要交学费，我想后来如果大家知道毕业后有特岗教师这样的安排，估计师范院校会很火热。当时我们都错误地认为，师范院校是针对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所做的安排。据说，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第一志愿。然后，大部分同学又都回到了新疆。

虽然我对那几年的学习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惧怕，但是并不否认，是“内高班”让我有机会看到新疆与内地教育的差别，新疆与内地沿海城市发展程度的差别……。也让我明白，其实内地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理解非常有限。我也很难断定，这四年中，那些与我们有过直接接触的当地人，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加深了对新疆的理解；或者，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增加了对新疆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偏见……。或许兼而又之吧。起码，在学校里，从预科到高三，就总少不了有一两个老师对“帮助”我们而表示不满。

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信息，开办十几年后，“内高班”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，现在有50多个城市开设，人数也累计达到上万。并且，除了内高班，也出现了“内初班”、协作计划学院以及“内职班”学校，专门由自治区教育厅专设的新疆班部来管理。

因为“内高班”的扩大，有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称我们为“被偷走的一代”，即我们在内地汉族集中地区完全用汉语学习，会渐渐淡忘本民族文化。一名有“内高班”经历的“民考汉”学生说：“我一直对这一制度充满警惕，不过不可否认，在内地大城市学习确实提高了我的竞争能力。”

我想父亲最终会明白，其实进了“内高班”，并不等于一切就变得顺利了。到了大学，我一样要去贷款；毕业后，我也一样找不到工作……。

